

以苦为荣，以岛为家

『西沙伉俪』杜永天、陈惠华守岛十余年：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黄宁馨



杜永天、陈惠华在西沙工作，1956年12月结婚。3个孩子生于永兴岛，自左至右为杜西沙、杜南沙、杜中沙。

三沙记忆

原西沙工委办公室主任陈贻爱：

一日三沙人 终身三沙情

文\海南日报记者 缪影影

62岁的陈贻爱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翻开泛黄的纸页，一张张剪报贴得整整齐齐。

这是1998年陈贻爱从三沙调回琼海工作后，开始收集的有关三沙的剪报。满满的一本承载着她对那片美丽疆海的记忆，刻度着她曾经挥情洒汗的经历，更重要的是，它见证着她与三沙难以割舍的一段情谊。

“一日三沙人，终身三沙情。”陈贻爱默默地翻阅着剪报，似乎在这剪报的字里行间诉说的都是她和三沙的故事。

海里。

“那是为了海岛建设，为了家园，热火朝天、激情燃烧的场景啊！”陈贻爱目光闪烁，似乎心中的那团火又被燃了起来。

接待传奇独臂考古专家

在陈贻爱的心中，在她和三沙的故事里，还有一件让她难以忘怀，那就是她接待过一位自费七下西沙，两赴南沙的中央民族大学的考古专家，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独臂英雄。

那是1995年5月的一天，运输船到达永兴岛后，船上下来一位独臂考古专家，他的名字叫王恒杰。

“他说他的手臂是在抗日的时候，被炸掉的，还说他要去南沙群岛太平岛进行考古作业，但当时的时局不太好。”陈贻爱说，当时，南沙群岛局势异常复杂，越南、菲律宾的军舰经常在此游弋，海盗也是不容小觑的安全隐患。王恒杰当时做了最坏的打算，“我要用我的命来证明南沙是中国的”。

据陈贻爱回忆，王恒杰准备登太平岛时，装成病号，打起画有红十字的小旗，向台军表示自己是要“求医”而去的。但是枪声还是响了，好在子弹全部都落在身边的水域。

“游也要游过去。”陈贻爱说，王恒杰曾告诉她，当时的情况下，身为中国人却不能登上自己祖国的土地的巨大屈辱感令他气愤难平，他下决心一定要登岛。

后来是一名驻守太平岛的台军少将接待了他，并给他送来了饼干和饮用水，允许他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考古。

在太平岛附近，王恒杰找到了很多从秦汉到明清时期的陶瓷和铜钱等古董，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让王恒杰异常开心。“这就是证明太平岛从古至今都是中国领土的最好证据。”王恒杰曾多次这样说。

“1996年，我到北京出差，曾经去过他家。”陈贻爱说，因为王恒杰独下太平岛考古的事迹令她心生敬佩，所以只要有机会去北京就会专程到他家中看望。

“他的家里存放着铁锚，各种考古书籍，还有很多文物。”陈贻爱说，见面时，他们的话题依然是考古和太平岛上的故事。

然而，令陈贻爱没有预料到的是，那匆匆的一见，竟是她与这位首位登陆太平岛的大陆考古专家、这位传奇英雄的最后一面。

1996年7月1日，王恒杰因肺癌晚期去世，遵照他的意愿，他的骨灰永久地留在了南沙的土地上。

一条心守岛建岛

摇摇晃晃了十几个小时之后，凭栏远眺，那满目的蔚蓝深处，一座小岛的轮廓逐渐显现。

“那就是永兴岛了。”1992年9月17日，那是陈贻爱一生难以忘却的日子，那天她乘船踏浪，终于到达了 she 向往的那片海域，她梦想的那座小岛。

“从1955年到1964年，我的父亲整整在这里工作过9年。”陈贻爱说，住木板房、油毡房、喝雨水、吃萝卜干……自己去之前就曾多次听父亲讲过这里艰苦异常。但也许是对神秘的海疆充满了很多想象，也许是骨子里流着“闯海人”的血，当省政府从各市县选派干部到这里轮值时，陈贻爱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守岛一条心，建岛一家人。”陈贻爱告诉记者，正是因为这里孤悬海外，条件艰苦，所以从渔民到驻岛干部，再到守岛官兵，大家都是拧成了一股绳，誓把小岛建设好。

“岛上没有菜，全靠补给船运送，碰上台风天，船不到菜也就吃不上了。”考虑到这一点，陈贻爱就和大家一起建菜园，种菜吃。拔草、翻地、播种、浇灌……在烈日的炙烤下，他们建起了岛上第一座菜园，种出了35种菜。

西南中沙工委办公楼、卫生院、招待所、文娱中心、篮球场、疏水渠……为了改善驻岛人员的工作条件，丰富渔民的文化生活，陈贻爱所在的这套班子，积极推进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海岛上搞工程，人员、设备、材料都要靠船运，就连沙土都要运过来。”陈贻爱回忆道，当时的工程是由中建七局第三建筑公司承建，每每运输材料的船只停港，工人们就要将材料、沙土一袋一袋地扛到工地上待用。

“虽然工程由他们建，但岛上的每个人都很上心，驻岛的职工、渔民时不时会帮着工人们搬抬材料。”陈贻爱说，烈日炎炎下或者天气将变时，大家一起喊着号子，抬土扛沙的场面一直留在她的脑

忍不住在人群里搜寻陈惠华与对视的目光。

再后来，陈惠华从他的“粉丝”变成了搭档，他们排演合唱的《十五的月亮》甚至成为了每有晚会必被工友们点唱的“主打歌”。

在这一唱一和中，两颗年轻的心越走越近。1957年3月，他们正式结为夫妻，一罐从海南本岛带来的喜糖，四处分一分就算是给工友们置办的“婚宴”。然而，相比之下，工友们的“回礼”就要珍贵许多。

“领导带头把一间小木板房让我们夫妻，自己搬到集体宿舍和工人们睡在了一起。”说起此事，杜永天仍有感激，在一间茅草屋数人同住、一张旧草席几人共用的永兴岛上，这已经是“最大的优待”。

再后来，夫妻俩有了爱情的结晶——1958年、1960年、1961年，他们的三个孩子相继出生。有趣的是，杜永天给他们分别取名为西沙、南沙、中沙。对此，他没有更多解释：“我们的想法很单纯，就是要让孩子们记得，他们出生在祖国的南疆。这是我们的领土，满载我们的荣光。”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西南中沙群岛还未建立一级政权，孩子们的户口所在地只能填写为“海口市”。但杜永天始终认为，“我的孩子是真正的‘三沙人’，他们在那里出生，在那里成长，血液里永远流淌着我们‘三沙人’以苦为荣、以岛为家的精神。”

时光如驹，58年过去了，杜永天和陈惠华已经不再年轻，二人始终留恋的三沙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自身患有眼疾，妻子身体状况也不适合长途奔波，杜永天携妻子重返三沙去看一看的愿望或许很难实现了。但每每有熟人从三沙回来，他们总要把人叫来聊一聊三沙的变化，聊着聊着，飞扬的五星红旗、崭新的居民社区、笔直的椰林大道就仿佛出现在眼前。

“老伴啊，那里有我们的幸福，也有我们的甜。”同忆三沙难忘事，杜永天和陈惠华始终没有放开相握的手。

海南农业生产的。

“当时，我和50多个工人、3个卫生员一起，从海口出发到潭门坐船前往永兴岛。那艘当时海南最大的木机船一开就开了30多个小时。”也就是在那艘船上，晕船晕得路也走不动的杜永天邂逅了陈惠华，“她就是那3个卫生员之一，总背着一个药箱。终于看到永兴岛的那一天，船上的人们欢呼雀跃，她笑吟吟地来搀扶我，‘走，去看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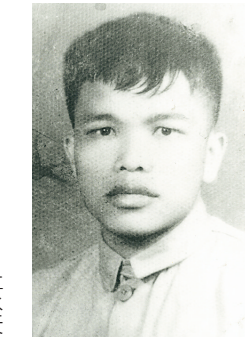
环境之艰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没有一间房，没有一张床；没有瓜果蔬菜，也没有足够的淡水。因为担心从海南本岛随船带来的白米不够吃，杜永天等人每回煮好饭都要把锅巴刮下晒干收好，留待补给船来迟时泡水煮了填肚子。抽过的烟屁股也舍不得扔，同样收好了等“弹尽粮绝”时又拿出来过过瘾。在这样的情况下，青年们白天齐心协力砍树割草盖宿舍，到了晚上就以天为被、沙滩为床，在海风的轻拂中相互鼓励着睡去。

岛上的蚊虫蛇鼠不少，敢大喇喇地从熟睡的人身上爬过。杜永天惦记着在船上撸了自己一把的好心姑娘，总在夜里悄悄地为她盖上几片芭蕉叶防寒防身。这些陈惠华并没有察觉，她只记得，只要自己背着药箱到山里给工人看病或包扎，就会有一个模样憨厚的小伙子小跑着来接药箱，一言不发地跟在后头。

孩子取名中南西沙

岛上的生活是枯燥的，没有电视、广播、收音机，就连报刊杂志也没有多少。每当夜幕降临，劳作了一天的青年们就聚集到沙滩上，借着永兴岛与生俱来的地势条件，把高处当作舞台，低处当作观众席，自发地上台表演节目。

“有唱海南戏的，有表演小品的，也有表演舞蹈节目的。”更多的时候，杜永天会上台给大家唱唱时兴的情歌，《达坂城的姑娘》、《康定情歌》、《十五的月亮》……每当唱起“那里来的姑娘辫子长，两个眼睛真漂亮”，就



杜永天、陈惠华进驻西沙永兴岛时留影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哪，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呀，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歌声悠悠，蕴含情意万千。年近耄耋的杜永天哼唱着，把已经开始模糊的视线，投往妻子陈惠华的方向。

这首歌，承载着他们在西沙群岛工作生活十余年间给那片土地留下的青春和爱恋。杜永天这一唱，陈惠华这一和，就濡濡以沫地过了半个多世纪。

以天为被，沙滩为床

1956年1月，刚刚从海南财经学校毕业不久的杜永天被安排到海南鸟肥公司担任会计。这听起来是个颇为体面的工作，但年仅19岁的他有点忐忑——那鸟肥公司的所在地，是人迹罕至的西沙群岛。

原来，海南农业部门在1955年用1个月的时间考察了西沙群岛的13个岛屿，勘察出岛上的鸟肥蕴藏量高达260多万吨。这一调查报告直接促成了鸟肥公司的成立，而杜永天等人就是第一批被派往西沙群岛采挖鸟肥，支援